

丘吉尔的假牙“拯救”了英国



年轻时丘吉尔说话“漏风”

丘吉尔16岁在伦敦附近的哈罗公学就读时，便饱受牙病的困扰。那时母亲经常抱怨，家中大把的银子都花费在了他的牙医账单上。到了20多岁时，丘吉尔的前上齿便几乎全部提前“下岗”，并因此落下了说话漏风

的毛病。无奈之下，他找牙医制作了一副假牙。然而，丘吉尔最初的假牙由于系用硬橡胶制作，佩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因此更多时候，他都只好将它取下，揣进口袋里。有一次，他一不留神一屁股坐了上去，结果将它当场压坏，之后只好找到牙医进行修复。

丘吉尔的第二副假牙是固定在一个巨大的假上颚上的，虽然比第一副略感舒服，可是仍不尽如人意。而得到一副咬合紧密、佩戴舒服的假牙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二战打响之后，1940年5月，丘吉尔就任英国战时联合政府首相。随着战局节节吃紧，丘吉尔时常感觉心烦意乱。有时他甚至用拇指将口腔中的假牙撬下，然后将其重重摔向墙壁！

牙医量身订做上好假牙

二战期间，丘吉尔几经辗转找到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牙医威尔弗莱德·费希。那次就诊时，丘吉尔用白兰地代替难闻的漱口水，还吸了两支雪茄。

费希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副假牙，但自己的得力助手、牙科技师德雷克·库迪普加工制作。为了以防万一，德雷克还特意制作了一副“备用假牙”。多年后，德雷克的家人将其无偿捐赠给了位于伦敦的皇家外科学博物馆。

费希大夫设计的假牙让丘吉尔十分满

意。从此，他说话不再漏风，经过刻苦的磨练，他演讲时的措辞、语调和手势中处处透出非凡的勇气和力量。二战中最困难的时期，丘吉尔每天鼓舞人心的反法西斯广播演讲几乎成为英国军民的精神支柱。

从1952年至1954年，已经进入第二届任期末期的丘吉尔多次写信向费希大夫致谢，甚至提议向后授予爵士头衔。在一封写于1954年1月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非常荣幸地推荐你被授予这一实至名归的荣誉。随信附上一副假牙，如果你能够帮忙将它们再拧紧一些，我将非常感谢。其他的几副一直工作完好。”

一副假牙“拯救”了英国

据悉，丘吉尔这批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写给费希大夫的书信于不久前首次得以公开发表。

一名皇家外科学博物馆的发言人表示：“对丘吉尔而言，一副舒适合体的假牙就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心理道具和生理道具。它使得他能够自如地说话——对于任何政治家而言，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语言技巧是导致他成功的一项最重要的因素。要知道，自从丘吉尔成年之后，便一直担心失去自己的语言能力。”丘吉尔振奋人心的反法西斯演讲为英国军民吹响了号角，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惊呼，丘吉尔一副假牙拯救了英国。

(摘自《人民网》)

蒋介石军事顾问竟是苏联间谍

德国人瓦尔特·斯滕内斯，是纳粹头目希特勒的前战友，曾经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瓦尔特·斯滕内斯竟是一名苏联间谍(代号为“朋友”)。

德籍军事顾问受蒋介石重用

瓦尔特·斯滕内斯，1896年生于德国一个小农庄里，一战中参军并很快提升为军官，在部队中与“二号纳粹”戈林结为莫逆之交。1920年经戈林介绍与希特勒相识加入纳粹党，并开始为纳粹组建冲锋队。到上世纪20年代末，斯滕内斯手下的冲锋队已达4万人，后与希特勒的关系破裂而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他率冲锋队员谋反，攻下柏林党部。希特勒欲处死他，后因戈林出面说情，“元首”才放了他一命。蒋介石对这位希特勒的政敌非常熟悉，看中了优秀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便邀请他来中国当他的私人军事和政治顾问。

1934年2月，斯滕内斯来到中国，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斯滕内斯为蒋介石抵抗日本军队出谋划策，获得了几次胜利，从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秘密投靠苏联

希特勒政府原与国民政府一直有良好的外交关系，1939年，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服了希特勒，为了同日本结盟拉关系应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因之驻华德国顾问很快就奉召回国。而斯滕内斯若回国就意味着去送死，于是他闻讯后决定秘密投靠苏联，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实在不行就去苏联政治避难。

1939年1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驻上海情报处特工季先科住宅的信箱里，有人悄悄投进一封没贴邮票的信件。信的内容一是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表示愿意为苏联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分文不取。二是：必要时到苏联政治避难，以此作为交换，署名“朋友”。

季先科立即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局局长菲京汇报了情况，在菲京的亲自授权下，于1939年3月4日在“朋友”的上海寓所里两人秘密会见。“朋友”告诉季先科：他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希特勒建立民主德国。随后他透露了德国准备同邻国和苏联大战的计划，“朋友”还提出他作为蒋介石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定期同英、美、法交换情报，他可无偿向苏联提供这些情报。苏联情报部门领导认为“朋友”大有利用价值，从此和他保持紧密联系。

“朋友”无偿为苏联提供情报

1939年夏，苏日冲突爆发，哈勒欣河战役打响后，应苏联之求，“朋友”为其搜集了不少有关日本的情报。同年7月1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潘友新抵华，斯大林给他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让蒋介石政府维持抗日立场。而这一使命的完成离不开斯滕内斯帮助，他以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身份完成了这项有关苏联生死存亡的任务。

1940年冬，苏联情报机关派特工扎鲁宾赴华与“朋友”接头，获得重要情报：德国对苏战争从军事到经济都已准备就绪，战争将于1941年5月底开始，计划首先占领乌克兰和顿巴斯，德国计划3个月内结束战争；希特勒还计划让日本从东方配合，同时进攻苏联，但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朋友”还建议：为了反希特勒战争的胜利，苏联应该继续援助蒋介石政府，把日本陆军拖住。

1941年秋，“朋友”又告诉苏联：日本暂时无法分兵进攻苏联。于是，苏联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一情报，大胆地把几个精锐师团从外贝加尔和远东调到莫斯科参战，从而保证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斯滕内斯在苏德战争期间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珍贵情报，分文不取。他化解了德国外交家和特工怂恿蒋介石同日本媾和的努力；同时，他又破坏了蒋介石为了在抗日战争中获得喘息机会而挑起日苏战争的计划，给苏联帮了大忙。

1950年，斯滕内斯回到德国，他岳父病逝，他获得大笔遗产，在生活无忧的情况下他又重新投身政治，表示愿意继续同苏联合作。但苏共知道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对他不放心，永远终止了同“朋友”的接触。

2002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解密的一份档案材料，揭开了瓦尔特·斯滕内斯是苏联间谍的内幕，而这距蒋介石逝世已是20多年了。

(摘自《人民网》)

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始末

交谊舞进场

人民大会堂，这座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全部的建筑面积还要大。

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1958年建成初，人民大会堂每周有一到两次的对外开放日，但在“文革”期间已中断。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在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在这个夜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被叫作“封资修”。

同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7月1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也正是从那时候破冰。

当时到大会堂参观收取两角钱的门票；在万人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不久后一些小范围的演出或电影也陆续开放。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

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10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开会的业务。

1994年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不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最早的业务也与人民大会堂有关，现在他的公司已占据大会堂开中介业务的1/3。

李志起这样解释大家的“兴趣”：一开始，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激动万分”的申办者。1996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的地方。“那时1997年还没到，香港尚未回归，他的激动可想而知。”李志起表示。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香港厅自1997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

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

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容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内部改革：国宴厅卖份饭

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相对应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民大会堂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一个管理细节是，到1984年，国宴厅甚至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份饭”。

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说，国宴厅卖份饭，既有参观群众的需求呼吁，也有上级领导的支持。

这仅是大会堂诸多企业化改革事项的一个。苏秋成介绍说，1984年，人民大会堂正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时任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

在80年代，大会堂年财政支出每年约为几百万元，几乎没

有收入来源。于是大会堂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了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从1984年起，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构，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开始的五年改革，被称为大会堂“挖潜”及“开源”的重要开始，“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从那时起，大会堂“悄悄”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会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尽管审查手续严格，但开放的小窗口，已经是国人欣喜的大窗口。

改革仅两年，到1986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到1991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万元。1990年4月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

历经近30年的自身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人民大会堂对处理各种疑问也更加从容。

(摘自《人民网》)

